

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 ——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 ——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2001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18 日在北京昌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郭永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秦孝仪,以及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学者 100 余人。

会议提交论文 40 篇,主要涉及: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国政局与外交;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侵华罪行;日本右翼思潮的历史与现状。现就会议的主要论点做一简述。

一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国政局与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荣维木的《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变化具有分裂的现实与统一的趋向并存的明显的双向性,后者最终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值得总结的重要教训是,日本正是利用中国的分裂而施展侵略阴谋,使它对中国的局部侵略到全面侵略步步得逞;而日本的侵略最终又弥合了中国的内部裂痕,使中国形成了抵抗外

侮必需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事实证明,中国分裂是引发日本全面侵华的内部原因,而日本的侵略又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外部原因。

对于绥远抗战,以往的观点说法各异,但往往猜测多于分析。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的《1936 年绥远抗战始末》,利用了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档案,并综合《徐永昌日记》,对绥远抗战的始末、内幕做了深入细致地分析,指出:绥远抗战虽然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并无中央军直接参预,“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都是在蒋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按照蒋的打法,绥远抗战应有更大的战绩。无奈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绥远抗战中途停止,未能达到蒋预想的结果,既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不稳的影响,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 11 月 27 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意见冲突,调和不下的一种结果”。作者还分析了蒋介石以战迫和的心理和决策。

军事科学院罗焕章的《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战争》,论述了从东北沦陷、七七事变一直到反攻阶段开始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战的全过程,指出:东北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和贡献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段晓微的《试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发展的过程及影响》,论述了在国共合作基础上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发展的过程及影响,认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合作成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小冲的《九一八事变:一个台湾的视角》、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副院长霍启昌的《浅释“九一八”与香港华人民族意识的澎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张量的《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

众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抨击、他们的反战斗争和对祖国的向心力；九一八事变后香港华人民族意识的澎湃高涨；澳门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义卖筹款、奔赴抗日前线。

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王晶的《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工会》分析了随着九一八事变前后至一二八事变前后中国政局的变化，上海银行工会的相应变化，其所关注的问题从本业扩展到国内时局，对上海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消极自保转趋积极投入，反映出上海银行工会在民族危机紧迫之下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化。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上田贵子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工商业者》，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商业者的两个群体：部分离开东北，在关内组建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另一部分留在东北，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反抗日本侵略者，但他们在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的消极抵抗应有别于少量的汉奸工商业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以关税自主交涉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论证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几年，国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自1927年初已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英美两国，逐渐获得了中国民众的好感；而日本政府不愿调整政策以顺应中国形势的变化，仍然以旧思维和旧方式拒绝承认中国有宣布旧约终止的权利，并曾想抵制中国实施暂行国定税率。在中国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中，日本陷于孤立状态，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最主要的对立面。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王真的《九一八事变与苏联的不干涉》，分析了苏联不干涉政策的原因是，把九一八事变看做是中国内部事务；国力尚不强大，避免直接卷入中日冲突。作者认为，虽

然不能把“不干涉政策”说成是“鼓励日本对中国放手的侵略”，但是，苏联在实行不干涉政策过程中表现出较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因素，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

武汉大学胡德坤、费泉蕙的《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浅论》，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经过失误和曲折，实现了从避战求和、经以战求和，到以战求援的三个阶段的转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时的中国外交概括为求和外交，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是建立在抵抗的基础上的，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其主流是抗战外交。

台湾学者刘维开的《蒋中正先生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一文，分析了蒋介石“先安关内，再图关外”的心理，并对“铣电”与“蒋张会面说”进行了考证。台湾学者邵铭煌的《从抗争到和解：汪精卫对九一八国难的回应》一文，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蒋、汪合作，认为这时的汪精卫发生了极大改变。

二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侵华罪行

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的《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华北谋略》，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前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在天津策动“石友三工作”，事变后土肥原机关又策动了两次天津事变；1932 年日本对“山东地方及华北”的对策；1933 年日本在天津的“板垣机关”，以原直、奉、皖系军阀人物为主要对象，实施华北谋略，迫使华北当局求和。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华北谋略，大多数均以短暂的失败而告终，但其活动配合了九一八事变的发动并构成华北事变的前奏或一部分。

辽宁省党史研究室谭译的《万宝山事件的远因近因及教训》，分析了被称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线之一的万宝山事件的远因与近

因,远因即日本利用朝鲜移民问题,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并制造冲突,然后再以“保护侨侨”名义出动军警,迫使中国方面让步,制造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近因指日本政府制造万宝山事件的直接的军事目的,是配合关东军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齐福霖的《三名日本少壮派将校与九一八事变》、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的《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分别就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阴谋策动九一八事变和由日本东亚联盟协会于1939年至1941年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组建东亚联盟团体的活动进行了论述。

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宅巍的《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演变》一文,分析了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四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指出:“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进程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证明:30万以上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是铁一般的事实,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得出的正确结论。”

吉林社会科学院解学诗的《关于“特殊工人”的若干问题》,论述了“特殊工人”的来源和数量,指出:日军将在华北讨伐、扫荡中抓捕的战俘与和平居民大批送往东北,以“特殊工人”之名强制使之服劳,是更为典型的强制劳役模式。作者据统计资料考证:到日军战败投降,进入东北的“特殊工人”有20万人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居之芬的《关于日本对华北强制劳工的掠夺与统制若干问题考》,利用日伪档案考证,认为:日本在华北本地企业矿山使用强制劳工人数约为300万人;1940年至1942年日本在华北大规模修筑军事工程强征民工人数应达百万人以上;日本在蒙疆使用强制劳工人数为40余万人。河北社会科学院何天义的《初论日军枪刺下的战俘劳工集中营》,论述了日军在华战俘劳工集中营的设置及类型、摧残战俘劳工的状况及手段、奴役战俘劳工

的过程、残害战俘劳工的特点及罪行。

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谢忠厚的《华北北支(甲)第 1885 细菌战部队之研究》,对这支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建立、组织系统、罪行事实进行了研究,指出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是侵华日军继七三一部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部队,它与其它日军细菌部队密切联系,成为日军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重要基地和战略交点,该部队在细菌工厂中使用数千名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在华北战场上配合“三光”作战,使用细菌武器残害中国军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农伟雄的《“九一八”后日本对热河的鸦片毒品侵略》,论证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指定热河为伪满洲国鸦片种植区的鸦片种植、经营状况,鸦片收获量从 30 年代末的近 1000 万两增加到 1941 年以后 1400 万两左右,成为热河的支柱产业。日伪政权在当地低价强购后向华北、华中等地高价倾销,以鸦片的暴利换回作战物资;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纯利通过秘密渠道流入日本大藏省的金库。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苏智良的《试论日军在东北实施的慰安妇制度》,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军慰安所的出现、东北慰安所的概况及“慰安妇”的遭遇、东北慰安所的分布与概况。认为东北地区是日军“慰安妇”实施最早、制度最完善的地区之一,“慰安妇”人数应在 65100—74400 人之间。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会欣的《步向全面侵华战争前的准备——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一文,分析、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强占东北海关,掠夺关税收入;阻挠西方对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援助;操纵华北走私;破坏中国实施币制改革等破坏行为,认为:尽管日本政府与军方在对华侵略方式上略有不同,但其战略步骤是互相配合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分析了抗战时期在日本扶植下的沦陷区伪政权实行的不同形式的电影检查制度,指出,沦陷区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电影检查,形式虽有异同,但其实质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是为了禁止可能出现的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影片而设置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乐敏、赵健民的《侵华日军在浙江地区的图书文物劫掠》一文,通过对日军对浙江地区的武力侵犯、日军对图书馆的破坏和图书掠夺、日军对文物的破坏和劫掠三个方面的调查论证,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文化、在浙江地区劫掠图书文物的罪行。

三 日本右翼思潮的历史与现状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郎维成的《“独走论”再评析》指出: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独走”,推卸日本天皇及其政府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从日军军队统治、侵华共识、昭和天皇是否“虚君”和“和平主义者”等方面分析,认为:昭和天皇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独走论”是日本战败前夕,昭和天皇与其近臣为维护“国体”而将发动战争的罪责转嫁到军部身上的阴谋。

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的《两战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其对外扩张理论》,剖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根源及其特点,比较分析了民间法西斯的主要代表大川周明、北一辉的对外扩张理论和少壮派法西斯军人石原莞尔等的对外扩张理论,认为:“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的基本特点在于,为论证对外战争的必要性,最大限度动员民众投入战争。它们遍及思想文化各领域,花样繁多、内容庞杂。既有对于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

蓄,更主要是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述形式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

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何理的《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右翼运动剖析》一文,从日本军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二律背反、右翼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和以维护天皇制度为核心国体意识三个方面,剖析了近代日本的右翼运动。作者还指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猖狂活动和日本国内右倾保守化的政治倾向,凸显出 30 年代日本右翼运动的影子,尽管它还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但亦应引起亚洲国家和日本人民的警惕。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步平的《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出现引起亚洲国家谴责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绝非偶然,需要结合日本教科书从战前、战中到战后的变化过程,联系战后日本社会关于历史教科书多次发生的风波,思考风波的深刻的社会原因。战前到战中日本教科书贯彻以天皇为统治核心的“皇国史观”教育;战后日本的和平进步力量批判了“皇国史观”,促进了教科书的“改善”过程,但在国际冷战结束和世界进入全球化经济时代、日本国内经济多年停滞、社会不安的背景下,教科书出现了“改恶”局面。这种“改恶”现象,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右翼企图在教科书中掩盖侵略事实,掩盖日本人的战争犯罪。这种历史观是对战后历史认识的严重倒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的《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一文,根据日本新版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及送审的“白皮书”等资料,探讨了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的形成原因,认为:战后日本社会对其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是有历史、思想、国际环境、经济诸多基础的。而“这一版本的教科书中所宣扬的历史观,正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日本国家关

于其近代以来对外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的典型反映”。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培林的《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理论”与当代右翼歪曲历史的谬论之剖析》,将当年日本侵略者侵略东北时期散布的“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等6条谬论,与今天日本右翼文人的“唱合”比较,论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理论”和当代右翼分子的谬论以及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继承性。日本宫崎公立大学王智新的《战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演变及其根源探讨》,追溯了教科书问题的历史演变,认为,教科书是根据具有法律性质的官方文件《学习指导要领》来撰写的,而《学习指导要领》是由文部省编写制订,因此教科书问题的责任在日本政府。日本琉球大学高岛伸欣的《教科书问题与全体日本国民的责任》则认为,出现教科书问题,一些有良知的人也存在认识上的缺欠,是因为战后政治上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思想上没有肃清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

(本刊)

(责任编辑:刘兵)